薪火相传

祖孙四代报效国家 赵门十人红心向党

——烈士赵恩霖的光荣家史

赵家后人珍藏的军列属光荣牌

赵恩霖革命烈士证明书

日前，笔者走进烈士赵恩霖孙子赵建勇（赵传奇六子）和重孙子赵鹏（赵传奇三子赵业华的孩子）家中，聆听他们讲述光荣家史，探究烈士四代人为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

赵恩霖，字雨村，1899年生于郓城县南赵楼村。少年时期就读于本村私塾，后入菏泽六中，1936年回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南赵楼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郓城县参议员。1940年在本村创办小学一处，使许多贫民子弟得到求学机会。并在校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在其影响和教育下，一部分学生秘密加入共产党。于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为支援前线，动员全村群众筹粮筹款；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使一批批青壮年加入了革命队伍；发动群众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为后来开展土改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鉴于赵恩霖的影响力和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时的赵楼村被评为支部模范村。

1946年秋天，敌人从叛徒口中得到消息，我党郓城县主要领导人王文在南赵楼村休停，敌人动用一个连的兵力半夜悄悄包围了南赵楼村，形势万分危急。赵恩霖得到消息，派人火速告知王文，王文按照赵恩霖提供的撤退路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赵恩霖为转移敌人视线，机智与敌人周旋。在河滩里他开枪打死三名国民党士兵后，被敌人包围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他全然不为之所动；敌人严刑逼供拷打，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始终没有暴露我党之机密，他的忠诚让党组织得到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血泊之灾。他的英勇气概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国民党反动派机关算尽也未从赵恩霖口中得到我党的任何信息，于是恼羞成怒，于当年10月将47岁的赵恩霖残忍杀害。

赵恩霖有四个儿子，父子五人皆是中共党员。长子赵传铭早年参军，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后来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遗憾的是当时赵传铭妻子与老家失联，其荣誉证件不知散失何处。

次子赵传英（革命烈士）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革命，任第二野战军连队司务长。赵传英作为部队补给的负责人，他恪尽职守，做了许多烦琐有益的后勤工作，得到部队首长的赏识。他日夜为前线首长和战士筹备后勤物资，部队战斗到哪里，他和部下就追随到哪里，为战士们准备可口的饭菜，驱除他们的饥饿和疲惫，补充体能。一次在为部队购买蔬菜的路途中，赵传英被特务盯梢，虽努力摆脱，但因敌众我寡，最终遇难，时年19岁。

三子赵传奇，中共党员，14岁参加革命，曾任万里同志勤务员，1942年为部队传送重要情报，在经过沟壕时，不幸从马上摔下，因腰腿负伤严重不能再赴前线，后回家乡南赵楼治病，转入地方武装斗争。解放后，赵传奇一直在老家务农，因对革命有所贡献，享受复员军人津贴，直至病终。

四子赵传泗解放后入伍，起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兵、空军飞行员，辗转数载，因其工作扎实、成绩优异，走上领导岗位。历任北京管理局油料科副主任、民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油料公司工会主席、中航油华北公司工会主席等职务。他作为空军领导成员，为我们国家空军事业的发展壮大鞠躬尽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5年10月患病去世，时年57岁。

赵传泗作为烈士的后代，其无私的品格和美德令人敬佩不已。病重期间，他特地嘱咐家人将自己一生积蓄的6000余元全部捐献给党组织。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空军有关领导在其追悼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赵传泗光辉的一生。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年清明节来临，无数的干部、群众、教师、学生来这里扫墓祭奠他的英魂。

值得一提的是，赵传泗之子赵煜鹏系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并兼职于共青团中央，他出色的表现和才能让其父辈感到欣慰和荣光。

另外，赵传奇共有六个儿子。长子赵家田、三子赵业华、五子赵建祥在部队服役多年，光荣入党，表现突出，为边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赵长檩（传奇六子建勇的孩子）当兵退伍在家。正是：祖孙四代报效国家，赵门十人红心向党。

赵传英烈士牺牲证明书

赵传英烈士墓碑

荣誉证书

赵传奇同志：

你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发此证。

中共郓城县委组织部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

赵传奇荣誉证书

孙子赵建勇、重孙子赵鹏等家人在向笔者讲述他们先辈感人事迹的时候，不时用手巾拭去眼角的泪水。是啊，赵恩霖烈士早年入党、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越。受他的影响，四个儿子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为驱除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奉献了毕生精力。

赵恩霖烈士和子孙后代的感人事迹只是中国千千万万烈士的一个缩影。他们像繁星，汇聚成百年党史的浩瀚辉煌。重现赵恩霖烈士的历史往事，为我们学习百年党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让我们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为践行“中国梦”奉献青春和力量。

赵金厚

赵恩霖烈士墓碑

红色印迹

马集镇：定陶区红色革命史的起源地

中共定陶抗日行政办事处（即中共定陶抗日县政府）与定陶县大队是于1941年1月底在马集镇成立的；共产党一系列政策（组建抗日民众组织、民主政府建设、减租减息运动、土地改革等）都是率先在马集镇开始的，所以说马集镇是定陶区红色革命史的起源地。

1940年12月31日，历经四个多月的“红三村”保卫战胜利，共产党、八路军声望大振，鲁西南根据地迅速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共定陶抗日行政办事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迅速成立的。

1941年1月初，地委派曹县李集区区长郭又新（郭小湖村人）到马集做筹备工作。他带区队两个班及部分同志在马集村、解庄村一带活动，先后会见由上级派回做统战和武装工作的王朝建、定曹游击大队大队长程书勋及灵圣区一批干部，在马集镇解庄村药铺召开筹备会议。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1月底，在马集镇张圈村召开办事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定陶各乡镇长、群众代表、民主人士等，达一万余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宋励华兼任主任，郭又新任副主任，宋励华、王朝建、程书勋分别发言。同时，经上级批准，在马集郭伯堂宣布成立定陶县大队，王朝建担任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200余人。办事处与县大队的成立，标志着定陶县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1941年9月，在马集村蔡西明客店院内举行定陶县工委和抗日县政府成立大会，李鸣亭任工委书记兼县长。

1942年3月，定陶县委在马集镇老官刘村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抗日形势，制定正确的对敌策略和政治经济方针，开展减租减息民生运动。

紧接着，在马集先后举办3至4期由党员、干部、抗日积极分子等300余人参加的减租减息培训班，并将减租减息运动率先在根据地中心区的马集、张圈等基础较好的村进行试点。

1944年夏末，定陶城东北一带已经打开局面，但还处于日、伪、顽、杂、匪、会道门等势力的联合统治下，我党的力量十分薄弱。1944年10月，经县委研究，并报地委批准，定陶县委、县政府迁往城东——先驻西台集，后相继驻姑庵、大陈楼、三义集、五大村等村。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的核心就是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剥削，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

1946年6月中旬，定陶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率先在马集举办土改训练班，并在定陶根据地核心马集一带率先试点推行。

记者 刘卫国 通讯员 姚永灿

红色印记

一枚印章

在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枚印章，这枚印章上刻有“农民抗日互助会”七个字，它见证了鲁西南地区农民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和“农民抗日互助会”的前世今生。

1936年，全国抗日救国的浪潮空前高涨。当年秋天，中共地下党员于子元受中共直南特委派遣，来到了鲁西南地区的韩集镇，以教学为掩护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当小学教员的程力夫与于子元取得联系，把于子元带回安陵集老家，介绍于子元到一处国民党时期的公立学校教书。于子元当时担任语文、数学教学工作，有时搞地下抗日活动，在学校里结识了安陵集村的知识青年杨贵德。

从1936年冬至1937年初夏，于子元、杨贵德、程力夫在杨贵德家后院西屋内举办农民夜校，周边村的许多有志青年积极参加。在夜校，于子元向农民讲述抗日形势、西安事变、红军长征过草地北上抗日、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和东北九一八事变，使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37年初夏，“抗日救国自治会”在杨贵德家成立，由杨贵德任会长、于子元任组织委员、程力夫任宣传委员，后来更名为“农民抗日互助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周边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农民抗日互助会”，为“七七”事变以后建立“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奠定了基础。“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的建立，为开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在动员群众支前参战，组织群众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和“反扫荡”斗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 常鲁燕 王燕 摄

峥嵘岁月

湖西红色摇篮

——忆湖西抗日中学

1940年底，湖西抗日根据地，湖西专署决定创建一所抗大式的湖西抗日中学，并于1941年3月12日在单县石破楼村举行了开学典礼。从1941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湖西抗日中学共招收八届学生，为湖西乃至全国培养了近千名德才兼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秀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强大的教师队伍

湖西专署对抗日中学十分重视，为学校配备了强大的校领导和教师队伍。

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兼任校长。李贞乾牺牲后，专署文教科长杨经元担任校长，并兼任数学课教师。他曾任济宁联立乡师校长，以深厚的学业功底和独树一帜的教学艺术被称为“杨代数”。冀鲁豫专署第三副专员刘专斋担任副校长，他是苏北地区有名的教育家，并教授语文课。八路军五县大队政治处主任朱煜如，是位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其担任副校长兼教政治课。北大毕业，曾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来湖西任苏鲁豫边区党委秘书长的赵勉仅任副校长兼教政治课。陕北公学毕业，随八路军主力部队到湖西工作的郭怀信担任教导主任。还有北大毕业的聂卜吾，曾和邓恩铭一起坐过监狱，和刘少奇一起在满洲省委工作，在湖西中学担任历史课。

这强大的校领导和教师队伍为办好湖西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简陋的办学条件

湖西抗日中学成立于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湖西抗日根据地又处在日本侵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抗日中学的办学条件是极其艰苦的。

没有教室，一年四季在野外上课；没有宿舍，寄宿在老百姓家里；没有课本，老师自己编；居无定所，背包当板凳，膝盖当书桌。

一位老人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在村子的广场上课，同学们席地而坐，几十双眼睛看前方用一扇门架起来的黑板，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并随时记着笔记。有趣的是，我们的课桌就是自己的膝盖，笔记本和讲义都放在膝盖上。白天不下雨，课堂就设在树荫下，冬天就设在能挡风的地方。”

由于湖西抗日根据地处在日本侵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生活极其艰苦，吃糠咽菜是常事。而且到了青黄不接季节，就连糠菜也难维持。但大家咬紧牙关，坚信困难一定能过去，胜利一定会到来。师生们就这样靠着坚定的意志和革命信仰，坚持上课，坚持学习。

艰难的授课环境

由于湖西抗日根据地处在日本侵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不时会遭到“清剿”，湖西抗日中学的办学环境是极其残酷的。日军一“清剿”，在野外上课也就不能坚持了，只能跳出包围，坚持游击上课。

一位叫李俭的老人回忆说：夜里行军，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不能有声响，不能有亮光，不能掉队，还要背着书包、背包、米袋、枪支子弹。前半夜还好，后半夜睏得眼皮都睁不开，都是半睡半醒地跟着走。一次夜里行军，下起瓢泼大雨，一些小同学和女同学体力不支，一次次滑倒在水里，爬起来再继续走，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就接过小同学和女同学的背包，大家相互扶持着前行。

面对敌人的铁壁合围，有时这样的游击式学习也难维持，学校被迫采取分散式教学。学校分散在三个县，相隔30多公里，学生吃住在老百姓家，老师巡回到各村上课，路上要穿过敌人的碉堡和封锁沟，时时都有生命危险。

1944年2月，敌情越来越紧张，为缩小目标，又采取了化整为零，让学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在老百姓的掩护下进行自学。

1947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山东，学校无法在当地立足，湖西抗日中学也随着专署机关北撤，三次北渡黄河，冬季时学生手拉手徒步过黄河。就在这样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学校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下来。

特殊的办学模式

湖西抗日中学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日环境，采取了特殊的办学模式，收到很好的效果。

学生在课堂上是学生，课下就是战士，就是工作队员。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打仗，一边学理论，一边参加社会实践，取得了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双丰收。

1943年，湖西抗日中学随专署机关游击到巨野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师生参加当地麦收工作，地点是日伪据点南鲁的敌占区。那时在敌占区搞麦收，就是在跟敌人抢麦收，经常与敌人遭遇，常常是一边打仗，一边收麦，紧张而又危险。湖西抗日中学历经半个月与敌人周旋，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第二次是到达金乡县时，上级抽调湖西抗日中学部分年龄大的同学参加嘉祥县麦收。学校让魏以伦同学带领50余位同学，连夜赶到嘉祥。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遭到敌人骑兵突然袭击，因寡不敌众，朱增荣、李敬峰两位同学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学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顽强战斗，直到完成任务。

这样的特殊办学模式，培养出了特殊的人才，湖西抗日中学的学生一毕业，就很快适应工作，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张广怀